

“消解”还是“重建” ——论中国现代哲学中形而上学的命运

韩立坤

(沈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沈阳, 110044)

摘要: 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型的主体内容即是形而上学的重建。而重建的理论前提则是中国哲学中形而上学的合法性问题。客观上, 围绕此问题展开的一系列讨论构成了近现代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思潮。面对拒斥, 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不但没有被消解、降格, 反而作为中国哲学转型的观念性前提, 成为“写的哲学史”的主要内容, 并在事实上推动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研究。因此, 准确梳理形而上学在近现代哲学史中的复杂命运, 正确把握形而上学观念的现代演变, 揭示现代形而上学重建的重大意义, 才能正确审视中国哲学史自身的发展路向和现代开展。

关键词: 形而上学; 科学; 本体论; 价值

中图分类号: B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7)04-0059-05

受西学影响,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界围绕形而上学的合法性问题, 呈现出降格、拒斥、消解与重建形而上学的诸多争论, 并直接促成了这个重大思潮的出现。在笔者看来, 透过形而上学思潮的复杂表象, 把握形而上学在现代中国哲学中的命运, 对于研究现代哲学史以及中国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 西学东渐对中国学界的双向启蒙使得哲学的学科自觉与“哲学合法性”问题同时呈现。而基于传统天道心性之学的特殊性, “哲学合法性”问题又转换为“形而上学合法性”问题。这样, 在中西古今的“十字框架”下去讨论形而上学的合法性, 就客观上形成了现代中国哲学中一系列的全新问题: 如形而上学的实质、形而上学的命题、形而上学的方法、形而上学与民族语言、形而上学与科学的比较等。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既为形而上学重建运动提供了“观念性前提”, 又在事实上作为现代哲学史的主流预设了中国哲学的转型方向。

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汉语语境中形而上学的复杂命运与哲学学科和哲学史之间的紧密关系^①。但也有学者夸大了西方拒斥形而上学思潮在中国的影响, 将经验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主流, 认为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史中, 形而上学已经被“消解”“降格”, 并基本脱离了中国哲学学科和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进程。这种观点, 不但没有准确把握

近代以来逐渐明确且丰富的形而上学观念, 亦会因为错置了这个重要的观念性前提, 而必然走向对中国哲学学科和现代哲学史的错误理解。这是因为,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过程即是“哲学”和“形而上学”这两个全新观念在汉语视域中的自觉过程。而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自觉又主要依托于对中国形而上学的特殊性的发掘与开显。这样, 形而上学的存、废之争就直接影响到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主要形式和实际进路。因此, 重新梳理近代以来形而上学在中国哲学中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 还原形而上学在拒斥和重建的思潮碰撞中的现实命运, 无论是对于从观念史的维度把握这一哲学观念, 抑或是从哲学史的维度揭示这一观念与哲学转型的同脉律动,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形而上学范畴的自觉与合法性危机

汉语中的形而上学观念之复杂面向与对“metaphysics”的理解密切相关。虽然 1623 年传教士艾儒略来华时已经将“metaphysics”介绍到中国, 但他没有找到对应的汉语词汇, 而是音译为“默达费西加”。1889 年颜永京在其所译《心灵学》中将 philosophy、human knowledge 及 natural science 都译作“格致学”, 而将“metaphysics”译为“格物后学”^[1]。

收稿日期: 2015-11-23; 修回日期: 2016-04-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思潮研究”(15BZX057); 辽宁省高等学校杰出青年学者成长计划项目(LJQ2014051)

作者简介: 韩立坤(1977-), 男, 黑龙江绥化人, 哲学博士, 沈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和文化思潮

这说明,此时期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到“metaphysics”与各种具体科学不同。近代的西学东渐,在对中国学界进行形而上学启蒙的同时,又将拒斥形而上学思潮带到中国。这样,一方面中国学者要思考形而上学与传统天道心性之学的关系,形成初步明确的哲学学科意识,又不得不尴尬地承受着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批判。在严复那里,“metaphysics”被译为“出形气学”“理学”“神理之学”。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在研究对象和思想实质上“metaphysics”与宋明理学相似。但他同时又认为科学可以解决经验世界的一切问题,甚至可以培育现代的人格和价值观。这样天道心性之学与各宗教系统,作为一种形而上之学,更适合在宗教信仰层面获得合法性^②。之后的王国维受“形而上学合法性”影响,亦将“metaphysics”即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知识的对立面。在他看来,形而上学是“可爱者”,科学知识是“可信者”,“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形而上学只能在信仰意义和情感审美维度具有价值。这表明,严复与王国维均反对彻底消解或取消形而上学。

如果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学者还在“伟大之形而上学”与“知识上之实证论”寻找妥协之法,即在承认经验实证的效用标准前提下,思考技术机械、科学与天道心性之学的各自进退存废之理据。那么新文化运动前后学者们还要应对西方休谟哲学、康德哲学、分析哲学等足以在内部瓦解形而上学的诸多挑战。从科学主义者来看,“科学的万能”是要超越科学和形而上学的界限,占领价值和信仰的维度。胡适认为形而上学就是一种“玄之又玄”的无用之学,只有科学才是“人类的最进步的科学知识思想”^[2]。从怀疑主义来看,休谟哲学提出了著名的归纳问题,并直接影响到康德,斩断了人类理性与宇宙本质之间的理论联系的可能性。以康德哲学为例,1923年,研究西方古典哲学的专家张颐说:“余自欧洲抵沪上时,所遇友朋,皆奢谈康德,不及黑格尔,竟言认识论,蔑视形而上学。”^[3]从分析哲学来看,维也纳学派以科学知识为唯一合法知识,将形而上学命题排除在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外,试图从理论的分析上瓦解了形而上学的知识基础。

虽然经受着外来新潮思想的冲击,但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并不因此而消解,反而产生强势反弹。1923年著名的“科玄论战”围绕形而上学与科学展开的大讨论,虽然不可能真正解决二者之矛盾,却为中国哲学界提出了形而上学的方法、自由意志与价值境界,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关系等全新问题。论战之后的新一代学者开始超越照搬西学的简单方式,立足中国哲学

传统回答形而上学这个核心范畴的各种问题,亦在事实上拓展了中国哲学的问题视域,并为形而上学重建奠定了理论基础。这表现在,在中国哲学视域中重新界定形而上学概念,并思考其与哲学的关系。如冯友兰早期受此论战影响,将形而上学界定为宇宙论。他认为哲学的内容:“第一是宇宙论,即是对于世界之道理的研究;人生论,是对于人生之道理的研究;知识论,是对于知识之道理的研究。而其中宇宙论又可分为二部:一是本体论,研究存在之本质及真实之要素,二是宇宙论,研究世界之发生及其历史。”^[4]在1926年的《哲学辞典》中将一般的形而上学等同于哲学。在狭义上,形而上学可指本体论,也可指对于一切形而上的“实在”的研究理论^[5]。在1934年的《新知识辞典》中,编者指出:“[形而上学](Metaphysical Science)是关于一切实在底基源的,关于世界底本质的,关于绝对的,无条件的和超验的东西的学说。……当作研究理智所可领会的实质的学说的形而上学可分为:研究一般的实在的学说即本体论(Ontology),研究宇宙的学说,即宇宙学(Cosmology);研究精神的学说,即唯理的心理學(Rational Psychology);和研究上帝的学说,即神学(Theology)。”^[6]而张东荪亦指出:“形而上学是人类认识中的一种具有特别性质与特别功用在文化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东西。”^[7]作为人类知识的重要领域,“形而上学系统”是与“常识系统”“科学系统”紧密的混杂关联在一起的,并认为形而上学承担着与宗教相似的功能,目的是为人类造出“理想的实在”。方东美同样认为形而上学根本目标是应当“集中于人类精神工作意义的探讨,文化创造之价值的评判”^[8]。在他看来,形而上学的主要形式就是研究本体为本体的本体论。熊十力也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哲学的研究范围日渐缩小。与西方文化中依靠科学方法建立的哲学不同,中国哲学主要是一种形而上学。而中国的形而上学,主要就是本体论、宇宙观。所以他明确指出“只有本体论是哲学的范围。……夫哲学所穷究的,即是本体”^{[9](14-15)}。当然,同时期也有学者明确反对用西方哲学中的宇宙论、本体论等外来词汇来割裂和套限住中国传统学术。如梁漱溟尽管认为中国学术中存在形而上学,并深入论证了儒家形而上学的思维特点、实现方法,但却反对用西方哲学和本体论的范式来重建形而上学。而吕澂也认为:“玄哲学、本体论、宇宙论等云云,不过西欧学人据其所有者分别,逾此范围,宁即无学可以自存,而必推孔、佛之言入其陷阱,此发轫即错者也。”^{[9](427)}但这种反对的声音,并不是赞同取消形而上学,而恰恰主张通过厘清哲学概念的不同意涵,正确地认识中国古代的各种形而上学

思想。

综上所述,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确实存在着一种“拒斥”和“取消”形而上学的思潮。这股思潮中的温和派将形而上学驱逐出科学知识的领域之外,但保留其在情感、信仰维度的作用。激进派则彻底否认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将其视为无任何意义的东西。但同时要指出的是,这种客观的思想波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崭新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资源,推动了中国哲学自身的建设方向,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即将此种拒斥思潮作为现代哲学史的主流。恰恰相反,面对“拒斥”与“取消”形而上学,在近现代中国哲学的语境中凸显的形而上学合法性问题,反而在积极的层面上促使更多学者理性分析中西方哲学在思维、方法、价值取向方面的显著差异,思考形而上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抽象性与民族性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哲学中形而上学的特殊性。同时,科学主义、经验主义、分析哲学等派别的“拒斥”与“取消”观点,也在向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哲学本有的道德理想主义和价值形而上学的致思方式。

二、形而上学重建与中国哲学的转型

事实上,19世纪末期的中国哲学在面对西学中的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潮时,已经开始了形而上学的重建与中国哲学自身转型的初步尝试。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将自然科学的“星云假说”“以太”“电”“质力”“原质”等知识纳入到本体论、宇宙论之中,利用这些全新内容重新诠释本体,论证本体。如康有为将元气与仁比附,而元气即来自于“星云假说”。“元为万物之本,人与天同本,于元犹波涛与沤同起于海,人与天实同起也。”^[10]他认为此本体即是道家的“道”,婆罗门的“大梵天王”,耶教的“耶和华”。谭嗣同认为,元气是宇宙的本源,而元气就是“以太”,即物质性的元素。他说“原质犹有六十四之异,至于原质之原,则一以太而已矣”^[11]。“以太”之能力是“通”,即是平等,是仁。所以他从“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推出“唯心”“唯识”,建立其日新的发展观和仁爱平等的社会观。而梁启超也认为“人间世一切之境界,无非人心所自造”^[12]。他将心与自然科学的力融合在一起,赋予心以更科学、更先进的能力,将心力作为形而上之本体。作为宇宙发展变化之根本,心力是社会发

展进步的根本动力。

和论证逻辑的维度去自觉重建形而上学,那么新文化运动之后,“形而上学合法性”的问题意识则与中国哲学合法性、民族文化信仰等紧密关联。面对各种拒斥思潮,梁漱溟、熊十力、张东荪、金岳霖、冯友兰、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均从各自立场维护形而上学的合法性。为此,他们着力区分“科学的方法”和“玄学的方法”,辨别“科学知识”和“形而上学知识”,突出科学和形而上学的不同价值。同时,他们既积极回应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命题的解构,试图解决一般性的形而上学命题的合法性问题,又努力论证中国哲学概念命题的特殊性,以此为融合中西哲学资源重建新的形而上学命题系统作准备。

梁漱溟明确肯定形而上学是文化的核心,在形态上,中国的形而上学与西洋印度的“全非同物”。他借鉴儒家形而上学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并利用西方心理学的“直觉”“理性”等思想改造古代的生命本心之本体范畴。熊十力明确主张“要以哲学的方式建立一套宇宙论”,力图使“此土之哲学或形而上学得成为一种学”^{[9](178)}。他批评离开现象、功用求本体的错误思维,始终从本体与现象、道与器、体与用的“对子思维”入手,创建了“体用不二”的本体论,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身心性命受用之学,为人生重新确立价值与意义的终极载体和信仰对象。冯友兰认为维也纳学派只能取消“旧的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本身则不能被推翻。他用逻辑分析法和共相理论改造程朱的本体论,构建了“理”“气”“道体”“大全”为主要架构的本体论。张东荪肯定形而上学能给人带来“感情的满足”“心理上的安慰”和“生活的勇气”。他立足中国哲学语言结构的特殊性,提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本体论,因此只能重建传统的宇宙论,进而提出了“层创进化的宇宙观”。金岳霖认为“和谐、统一的形而上学思想是人生意义或价值的担当者”,他赞同批评者对“老玄学”的批评,同时他又积极利用新方法来建立“新玄学”。他将逻辑上的“可能”作为本体、将“能”作为“可能”的现实化因素,通过“共相”和“共相的关联”来解释宇宙,建构了现代哲学最精致、最严密的形而上学体系。此外,20世纪中后期,海外和港台的新儒家学者如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均高度重视中国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合法性问题,并重建形而上学。如方东美根据东西方哲学中本体界与具体世界关系的不同,将西方形而上学称为“超绝形态之形上学”,而中国哲学则是“超越形上学”。他详细比较科学和形而上学,进而建构了情理交融的生命本体论。牟宗三认为西方哲学主要表现为“实有形而上学”,中国哲学则主要是“境界形而上学”。他以康德的“道德底形上学”为主要参

照,立足儒学传统,明确提出了“道德的形而上学”。唐君毅梳理了中西方形而上学史,全面论证了“形而上学知识”合法性问题,并以道德本心为形而上学的核心范畴,进而建构了容摄宇宙万象的“心灵九境”的宏大系统。

整体上看,尽管译自西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宇宙论概念逐渐淘汰了汉语中原有的“道学”“玄学”等学科意义上的传统概念,但中国学者却极少用西方的“存在”“是”“有”等替代“天”“道”“仁”“心”等去建立体系。并且尽管在问题意识和讨论内容上,中国学者如冯友兰、金岳霖、牟宗三、唐君毅等接续了世界哲学中的最新问题,并在汉语语境中深入讨论了共相理论、因果问题、可能性与必然性等问题,但在整体上,近百年来中国形而上学的重建之范式在基本格局上亦没有突破传统的天人论、理气论、体用论、道器论、境界论等形式。这些体系除了承担“描述”和“说明”宇宙结构的任务,还试图将科学以及科学的政治架构——民主纳入全新的宇宙论或本体论的生成逻辑中,以此为科学的中国化提供形而上的论证。这种尝试表现为在形而上学中讨论科学理性的生成逻辑和规范作用,以及在形上学的价值层级对科学信仰的安置与统摄。具体来说,在科学的生成逻辑上肯定本体的优先性,熊十力认为科学产生需要依据本体的“真实”;金岳霖从“共相的关联”推出科学知识的独立性;方东美将科学知识作为哲学思想向“境的认知”的转向;牟宗三则用良知的“坎陷”来生成科学理性。在纠正科学一元论的信仰上,熊十力认为形而上学才是“决定人生修养”的“智慧之学”;张东荪认为形而上学才能为人造出“理想的实在”;方东美认为与科学的“平面宇宙观”相比,形而上学提供的是“层叠的宇宙观”;冯友兰以“四境界”规范科学信仰;唐君毅以“心灵九境”统摄多元价值观。总之,虽然从一般的理论实质来看,20世纪重建的形上学在基本结构和方式上仍然属于“传统本体论”的形态,并均表现出整体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雅斯贝尔斯语)。但其在问题意识的思维高度、核心范畴的推理论证、命题阐释的义理逻辑以及哲学理论的创新推进等方面的显著成就,都使得以形而上学为核心的中国哲学史自身发展到了历史顶峰。

三、现代形而上学观念与 “写的哲学史”之互动

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视域中逐渐丰富且明确的形而上学观念,以及形而上学的重建运动,显示出天道心

性之学的致思传统在中国哲学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强大影响力。事实上,基于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而展开的对形而上学独立性、特殊性、合法性的诸多讨论,不但发展和丰富了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观念,提供了审视古代形而上学的最新方法、研究工具,亦为中国哲学自身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理论共识。也可以说,基于现代哲学家们不遗余力的对中国形而上学特殊的概念命题、方法工夫、价值取向的论证工作而重建的新体系,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理论定位。也即是,形而上学不但是“统摄全部哲学”之“学”,更是宇宙万物之“道”。形而上学不仅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之处,更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因此,现代哲学史所表现出来的学科化、逻辑化、系统化背后,还隐含着价值化、理想化、境界化的内在理路。具体来说,在本体的推导或证成方式上,现代哲学家为了避免古代哲学的“拖泥带水”的毛病,致力于将本体论、宇宙论抽象化、逻辑化、概念化,在“存在的形而上学”方面向西方哲学看齐,如熊十力的“体用不二”、冯友兰的“共相本体论”、金岳霖“式本体论”、张东荪的“层创进化的宇宙观”、方东美“生命本体论”、牟宗三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唐君毅的“心灵本体论”等体系,均在揭示真正本体的过程中,注重概念命题的内涵逻辑和推导论证过程,超越了古代哲学独断式的表述方式。另一方面,又延续传统“天人合一”和“体用一元”的思维模式,关注现实生活世界的秩序和意义。他们对应宇宙论和本体论形态的“存在的形而上学”而建构了境界论和价值论形态的“价值的形而上学”。这种“价值的形而上学”以本体为人生意义的终极承载,赋予宇宙万有的客观存在以价值的色彩。肯定在物质世界——科学知识——文化成果——本体世界的从低到高的层级中,人们会逐渐复归、体悟最高本体,获得最高的精神境界和人生价值,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追求人生境界的传统。

现代哲学家希望通过形而上学的两层维度来实现中国哲学自身继续解释世界、规范秩序、引导价值的功能。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使用调动了传统哲学的大量思想资源和思维方法,以对抗“拒斥”的思潮,但作为转型成果的形而上学重建显然不能被理解为是一种面对拒斥的消极应对方式。相反,现代哲学家希望通过这种新的尝试给出中国哲学自己的现代化方案^⑥。也即是面对西方社会科技至上、金钱至上、竞争至上的“现代病”,致力于促进与工业、经济、科技、民主相配套的精神信仰的现代化。这也决定了新的中国哲学在思维方式、实现方法、关注内容、价值取向等维度均不同于西方“知识型的哲学”。此外,虽然现代哲

学家始终主张区分中、西方哲学核心精神之不同，但却并不因肯定个性而拒绝共性，不因为民族性而拒斥普世性。他们依然在中国哲学中积极讨论着世界哲学的一般性问题，如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形而上学的合法性问题、科学的限度问题、知识论的问题，体现了中国哲学融入世界哲学的主动性、开放性、前沿性。因此，中国哲学的转型并没有因为形而上学化而自我封闭，各位哲学家依据形而上学所展开的人性论、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历史观、科学观等方面的研究，也拓展了中国哲学的研究视域，丰富了中国哲学的研究内容。所以我们可说，以形而上学为线索展开古代哲学史的研究与创建新形而上学来推进中国哲学自身的转型，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与发展的核心逻辑。

中国现代哲学史是中西哲学交流背景下汉语哲学现代转型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观念本身既体现了中国哲学融入世界哲学内在理路之客观走向，又在西学“中国化”和中学“现代化”的双重变奏中，切实通过围绕形而上学展开的各种“问题意识”和“理论模型”，参与并推动着中国哲学的发展转型。这种形而上学与中国哲学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还体现在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这是因为，围绕中国哲学中形而上学的合法性问题，借助现代哲学概念和方法，哲学家们亦揭示了传统儒释道为主流的形上学发展史的诸多特点，创造了一些全新的哲学概念命题，如“道德的形而上学”“超越的形而上学”与“超绝的形而上学”“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等，可以帮助学界更好的比较和梳理中西方形而上学史的同异得失。而对形而上学概念系统中的“形而上者”“本体”“体用”“有无”“理事”“理气”“大全”等核心概念的内涵辨析，对本体论、宇宙论、心性论等理论形态的比较，也前所未有的拓展了中国哲学的研究视域。受此影响，当代学界也从“心性形上学”“逻辑形上学”“生命形上学”“心灵形上学”“人学形上学”“境界形上学”等维度去审视中国哲学史中的诸多形而上学体系，切实提升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研究水平。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观念性的前提”，重建形而上学的观念自觉，还在当下推动中国哲学继续不断地发展。也即是，基于“写的中国哲学史”中形而上学的一贯传统和思想资源，尤其是近百年来重建形而上学的示范引领，新一代学者已经开始在积极探索继续创建新的形而上学，如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杨国荣的“具体形上学”、陈来的“仁学本体论”、胡伟希的“中观哲学”等。这些新体系，是在新的时代对中国哲学的继续发展，在整体上更富有原创性、更契

合中国哲学的主流方向和核心精神。这种客观性的研究趋势，不但深刻地揭示出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逻辑与形而上学之间的有机互动，亦直接证明中国哲学的当下及未来发展，均需在新的高度继续发扬形而上学的现实必然性。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论研究以往“写的哲学史”，或者从新的维度和高度去思考哲学问题和现实课题，形而上学都将长期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哲学的发展。

注释：

- ① 陈来，杨国荣，李维武，胡军，王中江，景海峰，陈鹏，柴文华，郁振华等学者均有文章讨论现代哲学家之形上学思想。在年轻学者中，彭国翔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之维度，考察了中西哲学互动背景下，现代学者对形而上学的重建，并认为新一代学者的形而上学仍然继承了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详见：彭国翔的“重思‘Metaphysics’：中国哲学的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 ② 严复虽然通常被理解为经验主义者，但他对形而上学和科学的关系处理则具有调和的一面。详见：韩立坤的《从“技”到“道”：严复“科学观”的演变——兼论近现代哲学中科学的形上学化倾向》，载《道家文化研究》，2015年总第28辑。
- ③ 现代哲学家对现代化的理解是应该被着重思考的问题。如梁漱溟就指出，建造新的中国社会，根本在文化。政治、经济的各种创新如果“不从宗教、道德、礼俗、法律这些新起”，就不是真正的转型。详见：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71页。

参考文献：

- [1] 陈启伟. “哲学”译名考[J]. 哲学译丛, 2001(3): 60-68.
- [2] 胡适. 胡适全集·第八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7.
- [3] 张颐. 读克洛那、张君勱、瞿菊农、贺麟诸先生黑格尔逝世百年纪念论文[N]. 大公报, 1931(207).
- [4] 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第一卷[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352-354.
- [5] 樊炳清. 哲学辞典[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6: 244.
- [6] 方朝晖. “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M]. 石家庄: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2: 277-278.
- [7] 张东荪. 思想与社会[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5.
- [8] 方东美. 科学哲学与人生[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9.
- [9] 熊十力. 熊十力全集·第三卷[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10] 康有为. 康有为全集·第二集[M].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373.
- [11] 谭嗣同. 仁学[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35.
- [12]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361.

(下转第76页)